

# 沈思於「諸神」的黃昏——以人物為核心的 晚清政治史研究之困境與可能

林文仁\*

在傳統以政治史為主流的漫長過往，以人物為核心的觀察路徑，一直是中國史學主要——在某些時期甚且是唯一——的論述依據。回顧過去數千年的中國歷史時，我們最基本的印象，幾乎是由一連串在過去數千年中，僅居於曾在這些時間與空間裡生存活動過的億兆萬民之巔峰的極少數姓名，排列而成。以人物為主體的政治史論述，本就有濃厚的功能性傾向，而人物研究所能呈現及解釋整體歷史的必然局限，似乎亦反過頭來進一步加深政治史論述的經世致用傾向，及制約中國人理解與討論歷史的方法。梁任公自〈新史學〉一文及《中國歷史研究法》以降，對傳統史學路徑所作令人熟悉的批評，相應者即不在少。此種史學型態，即令非一無是處，一遇走向多元解析基礎，自西徂東的現代學風一吹，原有的優越處都反成搖搖欲墜的萬矢的了。那些在以人物為主的中國史論述中，地位有如奧林帕斯諸神的名字，似乎已面對日薄崦嵫的黃昏，甚且年輕一輩的研究新進，在迫不及待投身於炫麗的新領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域之際，還刻意維持著與這些可和「舊史學」等同起來的封建圖騰的距離。

以人物為主的政治史研究漸次式微，固是學術發展趨勢下的結果，但各斷代之中，又以晚清政治史所面臨的局面最為複雜。時代較近，資料多元，固為此一領域之優點，相對地，也使建立學術共識，深化解析基礎具有較大難度。在治唐前史者，每以無一手資料為苦之時，晚清史已是「料」如煙海，一旦鑽進去，甚且非皓首窮卷可名。人言言殊之際，風向轉變，未及健全自身的有限成果，又將成為迅速擴張的新路線之分析論據。此不啻層層相因，長此以往，整體性之晚清史或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實在很難令人樂觀。

「零碎、老舊、沈悶」，或許是近乎殘餘的晚清政治史，所予人的直接印象。即非如此，所謂「晚清政治史」之認知標準，也已為如孔復禮（Philip A. Kuhn）之《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或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之類的作品所取代了。人物影像漸次模糊，代之以直接描繪的時代輪廓。惟讚嘆此類傑作的學術路數之餘，受過傳統史學深厚薰陶的人，卻也不免感到一份寂寞與茫然，彷彿此時才真發現那些透過檔案舊牘與之日夜相對的人物及其時代，真的過去了。

當然，事情的演變總是有原因的，傳統以人物為主體的政治史愈趨沒落，也不能只數落大趨勢的不留情。對於此一領域始終不能忘情的研究者們，或許只有認真地面對屬於此一領域的困境，才能找得出事兒做，而且還能持續地做下去。

## 為什麼有困境？

相較於對明之前各朝代的相關研究成果，以人物為主體的晚清政治史論著，在數量上，實不稍遜，但總讓人感覺少有傑作之選。早期如吳相湘、沈雲龍、李守孔三位著力最多，吳、沈二人尤畢生以此為務，除此之外，總覺



零星。平心而論，彼輩所面臨之主、客觀條件，確有差異。

首先，晚清史研究起始於新史學當道之 20 世紀，以人物為核心之政治史路徑，在昔時所享有的主流地位，已一變而為被批判檢討的對象，在此時期，對一新興領域行傳統之法，很難不被貼上視野陳舊的標籤；尤其西方史學理論，由主流派如年鑑，到非主流如後現代、後殖民等的依次引入，在研究結構上，更把政治史擠到最無足輕重的層次，而以人物為主體的部分，又被視為最不關痛癢。這實在很難令年富力強的研究者，產生經營的熱情。問題是，就歷史研究的整體性而言，那怕是以人物為核心的政治史，不也是造就分析架構基礎的一部份？

與上述發展相因，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滲透，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種理論或分析架構，帶給歷史研究更多元的面貌，與更豐富的討論空間。掌握一派理論路徑，運用相關史料，即令新進生手，似亦能鋪陳出一派風光，其中論點之新穎，說理之獨特，起三十年前史學主力之諸大師於地下，亦必覺瞠乎其後。事實上，筆者亦懷疑以彼等之史學「水平」，根本看不懂。某種意義上說，這也已使這些新貴們，置身於相當的高度。關鍵不再精，而在新。但也因以求新為勝，新貴們接受新的理論信仰與丟掉的一個思想架構的速度同樣地快；似乎稍遲一步，他們在史學市場上，便只能歸入祖先一路了。由「現代化」、「國家——社會」，到「後殖民」、「全球化」等，流動之速，令人目不暇給。誠然，新思維與歷史研究的參合發明，增加了理解的寬度，及深化解釋的媒介，但不自覺間的模式套用，只可能使史學愈走入狹徑，甚至死胡同。晚清史領域，資料相對豐富，研究仍多空隙，更容易成為時尚工具；當然，如果您願意代以「時尚新寵」，筆者亦無可異議。相對於此種多采的明星事業，傳統味十足的政治史路徑，幾乎成了不折不扣的「跳殭屍」了。乏人問津的研究領域，實在不能不被認為面臨困境。

當然，以人物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其自身特質，更是理解其困境的關鍵。檢視中國傳統歷史論述，我們自然知道，以人物為核心的政治史，事實上是士人階層全人養成教育的一環，而且是重要的一環，此種教育內容，負



有養成受教者經世致用立願的高度工具性，此一傳統，造就了以人物為核心之政治史研究的持續發達，惟一旦面對現代學術高度分工的環境，老一輩學者的成學背景與初志，便明顯跟不上結構調整的速度，相對地，他們所投身的研究領域與成果，便不易立足。循環以降，後繼者便益不免意興闌珊，左顧右盼了。

主觀條件的不利，還表現在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傳統上。自從蔣廷黻等學者，將晚清史作為近代史之一部分，帶上學術位階後，整個研究資源，基本上以官方檔案為主，尤其自 1960 年代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故宮博物院的先進們，進一步完成系統化工作後，確實造就不少優秀成果。但是，晚清史的優勢在資料多，挑戰亦在於此，尤其是龐大的私家筆記與個人日記，更是官檔以外，一項重要且不能不運用的資源。我們甚且可以如此說：沒有這些私家資料的融入，只以官檔為主的政治史必定殘缺而無法再深入，最終淪於有點無線，遑論成面之局。此一情形，直至今日，仍在努力中。儘管如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在 1967 年能以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一書，使包括西方學界在內，都能體見此一事實，但到了 1990 年代，如孔祥吉等在私家資料發掘與研究上卓然有成者，仍是非主流。歸根結柢，私家史料實在浩繁，且未如檔案已經有效整理、過濾，不免令人望而卻步，即令參用，多半各抓所需，蜻蜓點水。這便很難不在需要晚清政治史領域支援成果，以利造就整體史觀時，拿不出新東西了。如果肯定此一領域仍具高度價值的人，始終未能做好準備，那又能怪誰呢？

尤有進者，史料浩繁之外，年輕一輩研究者，讀清代檔案與史料能力上的參差，也使相對擁有同樣豐富條件的現代史領域，更容易吸收新進研究者投入，間接亦對晚清史研究隊伍產生擠壓。現代史資料量更大，可做之題目，隨檔案的逐步開放，幾近俯拾皆是；其與當代問題之牽連，更為直接，亦更能滿足研究者一窺內幕的想望。尤其，大部分史料，在閱讀理解上，較不困難。我們也許少見一個長期投入中古史以前領域之學者，轉治晚清，卻很容



易令一個治晚清史者，跨入現代史領域。這與其說是現實的無奈，不如說是學術環境深層面目的投影。

### 這種研究還有用嗎？

基本上，筆者相信任何一門學科，凡能存在、延續，必因其有用，只看如何用。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也。就此而言，以人物為核心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尚能有那些「大者」或「小者」？不賢如筆者，願舉幾點以供賢者識其大。

首先，就晚清政治史的基本定位，無論怎麼說，終是整體中國歷史不可缺的一環，其持續發展本身，便具有深化與進一步完備前此研究成果的任務，亦是投身此研究領域者的本分。此點不存，何論其他？相對地，任何試圖為中國歷史發展提出解釋者，也不能不有晚清政治史研究所不斷提供的思考元素。尤其此段歷史，在時空上，與今時較近，就為今之立足點尋求長期合理性之依據論，應更具參考價值，且不致因距離過短，壓縮視角，是可貴處也。其次，無論今之史學發展，已純學術化到何地步，中國傳統史學中之經世致用精神，畢竟是一大精神遺產。以人物為核心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在特質上，誠晚清史各領域中，對此點之承繼最為直接者。這倒不是說我們猶然要將這領域搞成政治工具，或道德準繩，而是研究成果本身，便具頗直接之觀照價值，尤其在公眾事務上。筆者從不相信什麼「學人從政」或「學而優則仕」的那一套，學者一旦投身權力關係中，必受制約，而無法維持獨立判斷或言論矣。惟學者不必成為政客，卻必須能指導政客，引領思維。經世致用，乃於此中自然流動也。

退一大步講，即純由實用層次論，以人物為核心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亦可做為學習者分析能力培養的取材，而且資源尤為豐沛，更進一層，即是領袖人物的養成教材。在西方，類似研究領域的成果，一直扮演此一角色，反而在走向學院化之後的中國史學裡，這一極原始之功能反似萎縮了。就為政



之方論，蔣廷黻早年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任內，即直言鼓勵學生，以學史為從政之準備；就陰謀之體論，則有如《雍正王朝》中，鄔思道所言幕僚之學；就經營之道論，嚴謹的政治史之人事理解，相信也必能勝過如坊間充斥淺薄的「胡雪巖式」再現氾濫。即令無心奔競名利場中，此領域之研究，至少亦可提供「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的休閒之雅。焉知在此風雅之中，潛生不出「臥龍級」的待時智人？

### 繼續做下去的可能空間與必要能力

既然還有用，且仍然可做，我們便要問問：該怎麼做下去？依筆者淺見，就以人物為核心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論，近年來持續發展中的官僚派系研究，即一具代表性的例子。派系研究，旨在進一步理解政治運用與決策思考的結構性問題，有利於為前此以官檔為基礎，形成之重要成果間，提供合理聯繫各「點」的「線」。不過，在此一路徑中，私家材料之運用，勢必更為重要。蓋官方檔案，或許能呈現決策思考與主張之對話，重構事件發展之基本面貌，卻很難看出更為關鍵之權力運作與折衝，及最終浮上檯面之政治真相，從而亦不易掌握單一事件間之有機聯繫，形成相對完整之圖像。因之，在研究能力上的要求，遂必更為複雜。

首先，具備閱讀晚清官、私檔案的基本文字能力，自是不在話下。一言以蔽之，即「看得懂」。這包括理解文件內容的能力，同時也包括對清代章奏制度的基本知識。多數官、私檔件需讀者自行句讀，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的事，也就時有所聞。但再以晚清政治史為主攻者而言，這不應該是個問題。

符合「讀得懂」的要求，更進一步，尚須「讀得通」。此於閱讀私家材料時，尤其重要。對那些史料或文本的製造者，我們是否能一一熟悉他們的敘事筆法？在實際接觸的過程中，不難發現，這些曾身處權力圈中的政治人物或記述者，藉日記或劄記以載其參與、觀察，或聽聞政情的過程中，很少是詳而暢的，而且愈接近核心之輩，其筆法愈謹而簡，甚且隱晦不明。對研





究者而言，如何由其中發現其真實心態，那就非下工夫不可。基本工夫，大抵有兩端：一在完整地用心細讀每一部私家材料——尤其是重要日記——之內容，有效掌握不同製造者之敘事筆法，與隱於筆法中之政治傾向與基本立場。須知私家材料中具價值之片段，往往在電光石火間，即於眼皮下溜過，看似平波無痕，實則暗潮洶湧，其機鋒一如實際政治運作般複雜，勘得不明，則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地稍縱即過。然欲求別具隻眼，又不能不下一重工夫，及建立對其時政治人脈網絡的基本理解，方有助於捕捉文字之間所透露之細膩互動。所謂敏感度，實亦由此逐步累積而就。試舉〈翁同龢日記〉中，載光緒 12 年（1886）6 月壬申日，慈禧宣示明年正月即行歸政，所引起之反應一段為例：

須與醇邸來，云頃召對，懿旨以皇帝典學有成，諭明年正月即行親政，伊懇求再三，上亦跪求（由邸指示），未蒙俯允。余亦曰此事重大，王爺宜率御前大臣、毓慶諸臣請起面論。邸意以為不能回，且俟軍機起下再商。一刻許軍機下，禮王等皆言力懇且緩降旨，而聖意難回，已承旨矣。余再請醇邸同樞廷請起，邸以殿門已閉竟止（定十二日王公大臣會商，再請訓政），余等遂退。……散後訪萊山，告以請訓政不如請緩歸政為得體，彼亦唯唯否否也。

短短一段文字，實已形同朝堂上權力結構與人事糾葛之圖像。當西后突作此宣示時，德宗乃於醇王懇求再三之際，予以暗示，方始同跪求，反映了慈禧與德宗之間互動關係的真實況味；就醇王而言，初聞言雖驚，但親生子之終得親政，逐步擺脫慈禧之控扼，又是彼心底最深之切望，因此未蒙俯允之後，退入直廬，翁同龢再三請醇王再請起勸請回意，醇王竟表現出猶豫推託，未了定了「請訓政」之宗旨，似有意以訓政進一步強化西后歸政之決心。但翁氏不以訓政為然，非為忠於慈禧，相反地，做為帝師及德宗最為倚重之大臣，一但德宗親政，翁必隨德宗實際權力之提升，而使其決策影響力及地位水漲船高，因此極不欲德宗背負「訓政」這麼一個掣肘且不知何日方休之尾巴，不如以靜制動，請緩歸政；而做為西后派下要角的孫毓汶（萊山），對此便



「唯唯否否」，以其不能不明翁氏心中之盤算，與權力關係未來發展之取輕取重。原只是記述了西后在其時一項政治宣示之相關情形，實有偌多引申討論之資源。不能見之，只當一件終無結果之記敘放過去，或只由此知慈禧於是年一度有此想法，終在諸王大臣堅請下打消一端，那就委實可惜了翁氏筆法中意在言外，方寸見天地的富藏，也預示了取材者用之於研究中的必然平淡無奇。

此外，對未刊之私家史料的持續關注與採訪，是另一重要，但不容易的工作。在這方面，由中國人民大學，而徙駐哈佛已逾十年的孔祥吉教授即一代表。十餘年來，孔氏先後發現，進而運用之未刊史料，甚為晚清政治史研究，提供新的可能，具代表性者，如翁同龢在美之後人翁萬戈手中數量甚可觀之翁氏家檔，及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之惲毓鼎《澄齋日記》等，餘不勝數。未刊史料之訪求，甚賴平日之留意資訊，及保持與相關研究者之互動接觸，即令如此，亦未必日起有功，但總不能中斷。焉知長期知見停滯之突破，即在因緣具足，鉤沈得現之際。

當然，浩繁卷帙之中，固存驚人之筆，但也最怕造偽之件。是以，辨偽之能力，即與善用材料，為一體兩面事，總在不被史料牽著鼻子走，不致既昧於真件深意，亦不辨造偽斧斤之跡。欲具足明見，要之總在多讀一端。

有了紮實的基本功，最終方能展現豐富的想像力，成敗關鍵，盡賴於此也。每常遇同道相商榷：如何能真正曲盡史料之深韻？基本功之養成自是不在話下，但筆者每常感有一重要部分，是相當「不立文字」的，勉強描述，或許就是所謂「想像力」吧。但此處云「想像」，又與一般隨所徵逐而引申建構之意義不同，而是一種真實體會。說得玄一些，研究者直感與史料製造者間已建立直接關係，身心投入，讀材料之過程，實如與文主對面而論，當此之時，鋪敘成文，何引何註，已不縈懷矣。文主之心思，如剖白於目前，於是段段相續，障翳均去，遂得治人物史之深趣。此種體驗，慢說筆者猶未相印，即令相印，亦難言詮，但確實存在，或許到此地步，自真明白何以以人物為核心之研究，至今仍不絕如縷，且依然為歷史研究不老之原型。畢竟，





歷史之中心，正在於「人」，此一根本，實非無窮無盡之理論辨析，能贊同異。史學，其實真是一種心地法門。請恕筆者如說食數飽，入海算沙之妄語，容就此打住。

### 餘感幾句

自從進入歷史研究的圈子學習以來，接觸過諸多年輕一輩的優秀研究者，也由彼等自陳之歷練中，得著長進，至今受用不竭。但是，在他們之中，投入晚清政治史研究者並不多，即令時期相近，亦多以民國史為優先。主要理由，實總在認為晚清政治史各相關範疇，該處理之問題都已處理，能使用，或便於使用之材料，亦已用盡，難求突破。事實上，所謂「突破」，實應指準備工作完成後的新進程。就此點而論，筆者以為，長期以來，晚清政治史的成果，仍在以「點」為經營重點的階段，就此一部份言之，確實成果頗豐，但亦反映了連點成線，連線成面，最終提供一完整認知體系的不足。就這方面看，晚清政治史其實仍大有可為，而且有許多責任須盡；而以人物為核心之範疇，在其中仍須扮演重要角色。

也許今時一席談，遠不足以改變一般人以為此一領域之研究，畢竟「零碎、老舊、沈悶」之成見，更重要的，似已不合時宜，甚且覺得面對如是必將耗費一生心力的龐大材料，最終只如生產線上之女工，裝配在終端之可觀成品中，一渺小難見的零件，未免令人氣折。筆者絕不否認那種生來即有著胡適筆下「兔子的天才」的大氣派名家，確實存在，而且總在屬於他們的時代，啓迪人智，激勵人心，使人們更清楚地看到他們的世界與希望。然而，不容忘記的是，他們宏觀論述的基礎，是建立在諸多長年辛苦於釐清大架構中每一環節者，所提供的有利條件之上。這些學者或許名不及於身後，卻是使歷史研究得以永續發展的基石。他們成功地扮演了巨人們的墊腳石，讓一代人在巨人肩上盡情延伸他們的視野。筆者每常深覺，學術工作原就是一種「成功不必在我」的事業，重要的是盡自己對這門學問的本分，也令這門學



問，能盡到對人群的責任。我們不擔心成爲生產線上一個女工，重要的是這項工作，於自己之意義。筆者總喜言，我絕不排斥一百個不知名如筆者之輩，造就一個陳寅恪或余英時。在如二氏者之著作中，每一個註腳，可能便有一段相期無負平生的故事。每思及此，便覺肅然，同時亦油生更大的誠意與勇氣。

最終，筆者還是想強調：沒有人能否認，任何所謂「小歷史」的深究，其目標仍在形成一個分析解釋的體系，提供群體一個有效自我理解的路徑。當然，能夠在此一層面做最大表現，也往往成爲人們評價一部史學論著的標準。過去將近三十年來，國內歷史研究受到歐美學術趨勢的影響，與各種理論對話，甚而尋求聯結的風氣，變得更爲興盛。晚清史之研究，躬逢其盛，且以發揮空間與可用條件之相對豐厚，幾乎成了各種理論體系大肆活躍的壇場。我們絕不否定，透過此種學風，爲相關研究所注入的生命力，然而，我們想不識時務地提醒的是，無論晚清史、中近史或中現史，是否有太多主體建構，仍待完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分析條件猶然有虞的情形下，與新興理論體系的參合互動，是否終究只是趨附形勢？若真如此，也難怪每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集中「消費」的新興理論，一過流行，即如灘頭沙堡，抵不住一個浪頭，便退個盡淨。接下去，另一波理論熱以中國近代史爲對象所進行的試驗，又將再度展開。於是，一批新主流——包含一部份經「深省提升」後再度跟上隊的前梯主流成員——重又入主，推動又一階段「殖民化」事業。周而復始的代價，卻是這個看似最具「活力」的研究領域，終究未能建立研究者對他真實的肯定與尊重。

是因爲研究者們的停滯、怠惰，使他們無力推動此一學門的進步，也提不出新問題嗎？抑或我們從未真正將全部精力，用於認真對待我們的研究上？不斷地，我向內追問自己時，總想起呂思勉「不誠安得有物？然則學問欲求有成，亦在嚴義利之辨而已」的話語，低迴不已。

